

历史与意志

——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
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杨张乔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导语：历史进程中的毛泽东 邓小平及其社会思想

一、20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历程

1. 20 世纪下叶，冷战时代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的后续发展，改变着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审慎地反思着自我体制的更新和自身在全球格序中的位置。世界在重新走合。

改革使差不多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封闭走向开放，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手段，几乎成了重要的国策之一。处在 21 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不再用同一模式来框囿并作为意识形态的标准，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努力地与世界接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由于存在民族的和历史的多样化，所以两极的发展都呈多元趋势。

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几千年的社会根基，使得自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显现出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社会变革的特殊本质。从自身特殊性出发的中国社会，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我改革的道路。

2.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的东方封建国家，曾以其自然地理、经济制度、文化体系以及社会结构的特殊的封建构筑，在相当长时期称雄于东方社会并稳固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明清时期，中国这一农业社会业已生成活跃的商贾、工场

手工业和繁华的都市群落以及诸多现代化萌芽。然而，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和强烈的农本情绪以及近代科技水平的滞后，使中国这一东方大国最终未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以致近现代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困难危重。

中国近代出现过三种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流派，即太平天国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社会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① 太平天国以朴素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为特征，它所关切的主要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现了农民渴望社会公平与平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社会主义思想，为人们设计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同世界，其实质意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建立近代文明。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把眼光转向社会主义，不但希望解决资产阶级关切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而且还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三种空想社会主义不具备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的趋势。学术界认为，如以 1899 年《万国公报》第 121 - 123 期发表《大同学》一文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入和实践的起点，则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19 世纪末社会主义学说传入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其间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经历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至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及其之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五·四

^① 该观点引自王继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

新文化运动实质性地推开了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历程。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走过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历程。过程和阶段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3. 近现代中国革命乃至现代社会发展进程里，毛泽东及其社会思想体系主导着历史的前行方向，他将传统的社会思想之精华赋以现实的和时代的意义，并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此作为改革中国的思想武器。其社会思想更多地具有政治社会学的特征^①，且具有本土和民族的基本倾向。这使得他的社会思想赢得广大农工阶级及其他阶级成份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赞同，成功地以最广大的农村去包围簇立于中的城市，最终夺取工农政权。在方法论上则是传统实学基础上发展的现实理性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不但正确地判断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及其革命的组合，而且在中国社会变革进程（时间和空间的）的把握上实践科学的阶段发展理论，不断纠正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阶级与阶级力量的组合是毛

^① 关于政治社会学的含义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政治社会学是国家学，仅限于研究民族国家。另一种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权力学，应该研究国家和各种人类团体、组织中的权力，探究国家权力的性质。

毛泽东政治社会学倾向，主要反映其对于封建社会四大权力——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批判和对于社会阶级、等级及其不平等根源的分析。他对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模式——包括新民主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功能、权力和政治制度等的论述，是对中国政治社会学思想的杰出贡献。

泽东特别关注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其中，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广大的阶级力量，这符合以土地问题的解决为目的的旧式民主革命的要求。毛泽东将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步和夺取工农政权的突破口，顺应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中国近现代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组合，农民问题是一个核心。

关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理论方面，毛泽东科学地把握了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三种社会形态在短暂的历史时速中的交替和过渡。在摧毁封建主义基础的同时，注意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社会阶级的联系，以使社会主义在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之后，更多地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和管理手段。这一总体思想支配着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无可否认，其社会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时期的冷战格局而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过多影响。

4. 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交替和过渡发展中，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相互关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具分歧的问题。它实质性地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的二、三十年代思想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有四种设想：以农立国；以工立国；节制的资本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倾向于后两种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节制资本主义模式中许多符合当时实际的东西。他与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可分离的思想渊源。毛泽东的具有本土特征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摆脱民粹主义，很关键的是，他在重视农村与农民力量的同时，善于处理现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对应关系。在工人

阶级与资产阶级都不强大、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都较薄弱的情况下，不但在阶级力量上，促成中国农民运动与工人的联盟，并适时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以完成土地革命，而且还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方式去扩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延缓的工业化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去作实际的推进。这一思想的前提在于中国社会民族资本的特殊结构、地位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共同合作的政治态度。

5. 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基础上的产物，也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必然会发展的社会形态。从西欧的历史看，社会形态行进次序被认为应是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又认为，由于东方社会所具有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即俄国农村公社和亚细亚地区的原始公有制形态的存在，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采取社会主义模式。而近代西欧社会形态则可能是在更变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经历社会转型后进入社会主义，其理由是私有制无法协调高度社会化生产的计划体系，必然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生产的计划性所替代。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必须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首先突破。列宁实现了他的理论目标。他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强行突破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突破，并不是指俄国经济的绝对落后，而是指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中，俄国相对薄弱。因此，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在世界大战期间需要经济、政治、军事的高度统一，可当战争结束后，列宁根据俄国的实际状况，瞬即提



出新经济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的模式：即社会主义 = 工业化 + 苏维埃政权，但仍需要资本、市场和商品生产的方式。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从俄国革命经验中，不但学到了夺取政权的武装手段，而且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实际发展阶段和建设阶段的体制取向。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方式的引入问题上，大体考虑到三种过渡形式：以新民主主义形式吸纳民族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大胆吸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6. 理论的难点在于对资本和市场的认识。资本与资本主义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大体可以这样认为，资本概念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资本主义概念应归之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范畴。然而，从历史的发展看，资本主义的前提是货币资本的积累。市场提供给资本所投入的空间，其前提却是互相间的交往（换）信誉。资本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本质。由于资本主义初期原始资本积累的残酷性，使得资本附着于政治意识和阶级结构的载体。其实，马克思对资本的解释是从最一般的经济学的角度入手的，只有将其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联结时，才将其看作是阶级剥削的一种工具。市场概念实际上是十分宽泛的。狭义的市场，可以理解是货物交易场所。广义的市场概念，则是商品化时代的一个竞争条件。但是，只有将市场调节的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时，也即将其作为市场经济的概念时，才与社会生产的计划性相对独立。按马克思的意思，确立市场原则，关键在于价格使然的供求关系的表征和经济特征。这种经济特征，并不是绝对的将市场与计划相对立。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下也追求成功的计划性探索。譬如西方国家在 30 年

代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即加强了对经济运行的国家调控，出现了所有制方面的国有化改革。垄断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追求一定范围的计划调控。市场及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作为一般的经济学概念而被引入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毛泽东在阅读与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赞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仍需要商品经济的观点，只是并未展开研究商品经济的过程及这一过程所要涉及到的资本与市场理论。

7. 邓小平是后毛泽东时期中国现代化模式和改革开放蓝图的总设计师。他承接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有效地提出了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理论，并从世界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大视野，以时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的互动关系，在较之基本社会制度范畴的更广层面上，区别资本、市场的制度属性和方法属性，大胆地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社会条件下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以及从终极效果到过程探索的理论抽象的判断问题，从而为社会变革重新设计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经济特区与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政策），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的社会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务实的经济社会学特征^①。

^① 经济社会学，是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形态或下属部门，也即“经济性系数与社会性系数之间的关系”。具体说，主要是按作用及组织的观点研究经济活动；研究经济结构与其他社会结构的关系；探讨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相互交错之处，从而研究两者的相互作用。

邓小平经济社会学倾向集中反映在其对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关系的大量论述，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的共同富裕、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风险、制度与体制的改革等问题的研究，确立了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地位。

8. 资本、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变革的最成功的经验，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范例，也是邓小平社会思想中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最大胆突破的部分。这其中涉及到许多问题，但企业的资产化与公司化管理是很关键的一步。对现代企业来说，资本的运行是公司化管理的核心，这从公司的组成及其运作过程中都能充分展示。资本运行的信息指示来自市场，失却市场支持的公司不可能有效地运行，资本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9. 社会主义在其现代化发展中的变革，是社会全方位的一种动态图例。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可能避免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社会问题，但是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风险必然也会存在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有可能会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城市化过度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引发诸多城市“病”；贫富差异并不意味着阶级分化，但社会阶级需要重新组合，尤其是要重视调整白领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地位和作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传统家庭制度与家庭关系、村落关系的变迁和公共领域新社会关系的变动；这些都是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也是邓小平社会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成份。

10. 21世纪中国将追求一种高水平的社会适应，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对中国社会来说，要适应的方面很多，最根本的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高科技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的适应，而对这两个根本的适应，社会主义需要作许多方面的自我调节的努力和尝试。

二、从政治社会学倾向到经济社会学倾向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常常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本著作除了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作出许多社会条件的前提性说明外，更重要的想说明，20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如春秋战国时期一样，社会思想异常活动，学术纷争不断，在那么多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对接中，毛泽东的社会思想正确地指导了中国社会的伟大革命实践；而后半期，直至1978年之后，邓小平的社会思想又成功地引导了中国社会的改革。这除了上述思想具有一定的实践性特征及其思想理论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外，非常主要的一点，是由于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思想本身所具有的许多理论特色、策略思想、逻辑力量以及个性魅力。

意志与历史，是相辅相成的一对范畴。历史奠定了社会精英们许许多多思想基础。不是任何精英都能精确地解释历史的发展、把握历史的进程、预测历史的未来。只有真正能理解历史实践真实性的人，才可能“酿造”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实践的基础是非常坚实的。

社会思想作为理论研究的解说对象，有着自己的逻辑发展的程式与规律。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的发展是按各自的思维逻辑行进的。当然，这些逻辑发展规律本身，与一个时代的历史性相关，也与历史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不同印迹相关。

逻辑发展规律，其实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

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致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总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发展方向与过程是一致的。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明显地可以分为两个在内容上不尽相同的阶段。一个阶段是以毛泽东社会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社会革命阶段，另一个阶段是在 1978 年之后，即以邓小平社会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具体地说，前者是从中华民族这一大概念上，首先解决这一民族的独立与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继而从这一国家主权的抽象意义上，突出了社会权力及其影响。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分析都在强调国家同整个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强调社会发展基本上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宰”的。国家、统治者和政治是派生因素，同社会经济基础相比，是第二位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由于把国家权力相对抽象，看作是上层建筑一部分，需要受制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直接与生产力发展相关联的“阶级”的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学说和社会学说的核心。阶级的利益和权力高于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的形式，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国家的政权。在这里，权力这一术语用来指一种特殊类型的影响或力量，它符合团体标准和价值体系。这样的理论概括实际上是把政治学——关系国家权力的系统——放到社会学的大框架中去解释。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体系被认为是人类关系的各种稳定的整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权力、政府和权威关系。这里所言之整体，就是指社会整体，它构成互为作用体系的人力的、物质的

和文化的基础以及内中包藏着的等级、阶级组织和功能的概念。

笔者所说的毛泽东社会思想更多地具有政治社会学的倾向和特征，正是从上述马克思主义最传统的看法得出的一种经验性的结论（而不是一般理论的推导）。何以谓之：

第一，毛泽东并不认为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而是突出了阶级权力的重要性，尤其是阶级的政党权力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立足改革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在封建社会，这种动力来自农民革命运动，而在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除了总体上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外，最强大的推动力量是农民阶级与农民运动。因为，这一阶层是中国的社会权力及其影响的根基。

第二，从上述阶级权力的概念出发，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的全部理论。其社会思想及其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指向是阶级与阶级结构。所以，他化了相当时间，研究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并由此得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以此成为他社会思想的理论“落脚点”。他的其他社会思想理论，都是从这一基本理论中延伸出来的。

第三，他的政治社会学倾向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始终把中国社会看作是一个具有互动作用的体系。在他看来，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其基本特征是构成系统的一切因素都是互相矛盾、互相依存着的，都要服从相互相调节的节律，而且也都应成为共同调整的对象。系统的定义在于它是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或牵动器运转的，通过矛盾运动形成一个统一的实体，对来自外界和其他系统的外部压力，以及对自身的各种因素的演变都会作为一个整体做出反应。理解这一点，

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即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各阶级必须作出整体反应，形成“抗日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思想给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历史运动的时间和空间。

第四，以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去认识阶级与政党的关系，比纯粹从政党学说去理解这两者的关系，更贴近现实的社会基础。因为，政党学说立足于本体的地位和作用，把政党这一阶级行动的特殊结果视为超越一般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政治社会学对政党的理解，首先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发展及阶级团体的客观要求。这也是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人物江泽民反复提请全党注意的“三个代表”论述的出发点。笔者认为，江泽民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七十年艰难历程的二十世纪末，提出“三个代表”的论述，实际上是把政党的行为落实到社会的坚实根基之中。当今国际社会（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注意到社会整体概念的时代意义。“市民社会”的重新提出并被普遍的接受，标志着社会政治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新整合与重新理解。所以，“三个代表”的论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建党纲领，而且在深层的理论背景上看，更具有实证的社会思想的丰富内容。

当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当中国人发现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出现巨大的“断层”之后，普遍产生一种要求通过现代化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这种整体社会的由各阶级、阶层所形成的共同心声，并不是一般的民族化情绪，而实际影响到社会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改革不

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主旨，不是去引导解决阶级的政治权力，而是解决社会阶级、阶层间的各种经济关系问题——一种比政治权力更加尖锐而深刻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则“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正统观点上，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强调，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前提，而社会主义又被视为多少是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然，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发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初衷就是在基本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体制”作以变革，这可以理解为是邓小平经济社会学思想的由来和发展。

从社会思想这一宽泛的大概念去认识，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思想的内容。要给他的社会思想作出相对明确的理论定位，是比较困难的。笔者将之作为经济社会学思想来研究，主动源出这么一些理由：

第一，从经济社会学的一般定义上看，邓小平的社会思想比较偏重于四个方面：1、按作用及组织的观点研究经济活动，从而从经济活动的灵便、自由性上，提出改革新的作用体制与组织程序体制，也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权力从属程度。2、研究经济结构与其他制度性结构的关系，从而不是孤立地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是首先从解放思想着手，继而当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求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3、探讨了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的相互交错关系，从而研究两者的相互作用，及时并准确地把握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关系。4、研究经济

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观点，从而有效地调节了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发展。这些方方面面的思想、政策和措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经济体制与经济行为的审视，是把经济行为及经济体制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形态。

第二，将现代化建设作为启动力，确立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在当今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常常把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单一的经济指标，而不是作为社会发展的整体指标去衡量。因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很强，而凝阻了自身社会的整体发展，尤其表现在不可避免的产生着激烈的文化冲突、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邓小平始终强调在高度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反复强调要预防和克服社会风险，避免出现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协调，实现了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这正是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第三，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点是解决体制（系）、组织与控制程序问题。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市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在经济社会学理论中，市场理解为一种非组织的，而计划经济表现为一种组织性。这仅仅是竞争时代的两种根本性手段的区别。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维护了经济社会学最一般的理论权威，将这一对被传统中国人认为最具有严肃的制度性和政治性的概念，从制度属性中分离出来，赋以一般的经济“工具”的性质，从而顺利地引导中国经济进入自由竞争的市场范畴，活跃了中国社会的经济行为。

20世纪，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思想分别代表了不同历

史时期的主流思想地位，从政治社会学到经济社会学，实际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同的社会成长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以社会学为母本的研究方法

笔者追求本著作研究方法与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的方法论相一致的倾向。从直观上，笔者的这部著作是一部社会学著作，阐述对象也即社会思想问题。

本著作不是“史”，它既不是论述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史，也不是描述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史，而是立足于论述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具像及其相关联的那种主流社会思想的历史作用。因此，本著作重视的不是史学的方法，而是社会学的方法。这一点与毛泽东、邓小平社会思想中所主导的方法论是一致的。

在第二章里，笔者单独将毛泽东社会调查作为一节加以论述，目的在于突出毛泽东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特点。社会调查可以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常识。然而，笔者并没有更多地论述这一关系，而首先去挖掘毛泽东社会调查本身的一些实证性方法以及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方法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

在邓小平社会思想里，笔者强调“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特点，并认为这是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思想对此前社会思想方法的一种承继。美国学者认为，在西方人看来，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中国与邓小平现实主义的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白天黑夜，他们难以理解，何以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代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势，为什么

会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文化？这段话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方法论并不是理想主义的结晶，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证主义的特征。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上述话语实际上应该这样表述，何以由同样的方法论却导致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即理想主义的与现实主义的。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对现实的不同的价值取舍。毛泽东认为，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意志是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是主要指标），强调均平的社会结构价值。这使他常常忽视了经济建设，而更多地注意到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合理性问题。邓小平将社会富裕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这一价值判断，使他将中国改革的重心不是放在政治体制而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从而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笔者还要引用美国莫里斯·迈斯纳的一段话：“既然生活力的发展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那么有助于经济建设增长的所有手段都允许予以使用，其中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某些方式，而现在判断资本主义方式的标准并不是看它的社会结果，更多地是看它的经济效益”；“邓小平时代的理论家们恢复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的观点。毛泽东曾经认为，中国幸运的是只经历了一个比较短暂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政权，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十分有希望，而他的继承人则把缺乏一个充分发展的真正的资本主义阶段看成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不足之一。”当然，后一种说明，并不能全部客观地反映邓小平社会改革的思想来源，但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待这一问题，却是邓小平反复强调学习与引进政策的一种历史依据。邓